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28 期（民國 86 年 12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與岸本教授論清乾隆年間的經濟

林滿紅*

一、基本論點

以往有關清乾隆年間的人口、農產、物價、銀銅兩幣與貿易的學術論者，大多只討論其中某一單項的發展，或討論其中兩項間的關係，討論過程較爲著重數據資料。「汪文」針對這樣的單項變數研究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學者認爲十八世紀人口、貨幣都增加，但有些學者主張在人口增加之後有人口壓力存在，有些學者主張在貨幣增加之後，民生轉而富裕，究竟十八世紀中國的老百姓，生活是轉貧抑或轉富，並不易讓讀者了解。這也就牽涉到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不同時段每人所得變化的問題。即使是計量經濟極爲發達的今天，計算國民所得，對於未透過市場交易的商品與勞務仍難以算入。有關歷史時期民生寬緊的探討，正如岸本教授所說：「用數值性方式來證明當時每人平均所得增加，這也是沒有辦法的。」在這種情況之下，與所得變化相關的文字資料以及相關各經濟變項間的關聯，也就特別值得細加揣摩。「汪文」是在乾隆年間重要幕友汪輝祖所觀察乾隆年間由貧轉富的啓發下，參酌人口、農產、物價、銀銅兩幣、貿易的文字與數字資料，推論其彼此之間的環環相扣關係而指出乾隆 A（約前四十年）、B（約後二十年）兩期的如下變化：

A 期（約 1736-1775）：在 A 期之內，人口顯著快速成長，貨幣因日本來銀大減，美洲來銀雖相對十七世紀增加，但增加緩慢，只有銅錢顯著增加。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因爲貨幣成長幅度常趕不上人口成長，因而每人所得減少，農業雖然成長，但有時也趕不上人口成長，而有飢饉發生，也因農業成長有限，還略小於貨幣成長，故糧價仍有所上漲；由於日本來銀大減，美洲來銀增加緩慢，長程貿易或城市經濟較難開展，人口與銅幣的快速增加雖支撐地方經濟成長，且造成錢貴現象，但因低值錢幣所扶持的經濟成長幅度不大，農村雖有新富，大多數農民仍處於貧困狀態。〔其各經濟變象的關係可化約爲：人口(P)↑〔↑表成長率〕＞貨幣(M)↑＞農業(Ag)↑→民生較爲貧困；銀幣需求(DS)↑＜銀幣供給(SS)↑＜銅幣供給(SC)↑＜銅幣需求(DC)↑→錢貴（長程貿易、城市經濟的成長不如地方經濟）〕

B 期（約 1776-1795）：B 期銅錢供應雖仍有所增加，但增加速度較 A 期稍緩，相對地，信用較佳的白銀則因歐美商貿開展而顯著增加，加上中國國內私票發行，形成 B 期貨幣供應顯著增加。至於人口方面，B 期雖持續增長，但增加速度則較 A 期稍緩，因而貨幣增加率超過人口增長的幅度，結果是每人平均所得增加。又因爲貨幣供應增加促進農業生產，以至農業較人口快速成長，故 B 期相對於 A 期的糧荒情況減少。又由於貨幣增加大於農業成長的幅度，因而非農業的消費增加，雖物價上漲而民生較爲寬裕。B 期長程貿易較爲開展所帶動的銀的需求大增，導致銀供雖然較增，卻仍有銀貴的現象。〔其各經濟變象的關係可化約爲:貨幣(M)↑＞農業(Ag)↑＞人口(P)↑→民生較爲富裕，飢饉較少發生；銀幣需求(DS)↑＞銀幣供給(SS)↑＞銅幣供給(SC)↑＞銅幣需求↑(DC)→銀貴（長程貿易、城市經濟較爲發達）〕

「汪文」在 1989 年撰寫時並沒有留意到岸本教授 1979 年「清代前期江南　物價動向」文所說：「或者說乾隆年間前半期的昂貴主要是以人口增加爲主因所導致以穀物爲主的昂貴。乾隆中期以後的昂貴主要是以貨幣流通量的增大爲起因所導致的一般物價的昂貴。雖然這樣的假設，有可能也說不定。但是，在現在沒有辦法得到除了米穀和生絲以外，其他商品在物價上漲時期的詳細資料的情況下，從片斷的資料中沒有辦法判斷，只好容俟以後再考。」但「汪文」著重點還不只是物價，而是民生。物價固然也影響民生，只是「汪文」是在其與人口、農產、銀銅兩幣、貿易等的交錯關係下談民生。岸本教授較爲關注的仍是各種商品單項物價資料的探尋，「汪文」重點則在根據目

前可以搜集到的資料，梳理以上各經濟變項的不同關聯如何導致不同時期的民生變化。

二、分項說明

（一）乾隆A期貨幣與人口的相對關係

1.日本來銀大減，人口卻又激增是乾隆A期經濟困難主因

「汪文」論證乾隆A期的經濟困境不只是來自人口的快速增加，也不只是來自貨幣因素，而是來自快速增加的人口適值中國銀幣重要幣源的日本銀進口大減，美洲銀又復增加緩慢。

中國於明清之際開始大量用銀以來，本身所產銀數遠遠不足所需，表一是1850年以前中國銀供的粗略估計，距離實際數字必有相當的距離，但可約略看出各種銀供對中國的相對重要性。其中，外國進口者遠遠多於本身所產。魏源於鴉片戰爭前後曾指出：「銀之出於開採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1]百瀨弘所著〈清代に於ける西班牙弗の流通〉一文中，推測魏源所說出於開採的十之三、四包括了安南和緬甸的銀產量。[2]R. M. Martin則直接視這兩國的銀產量爲中國國內產量的一部份，因爲這些礦產主要是由中國人提供資金、技術與勞力開採的，所開採的銀也主要流入中國。[3]

「岸補」(岸本教授10月中旬來函簡稱)引和田博德之研究指出，安南、緬甸銀礦主要產於本文所說的乾隆A期，這個論點是很重要的。因爲「汪文」有關此部份的討論，除了「岸補」所說根據Martin的著作之外，還根據全漢昇的研究，這兩個研究沒有像和田博德那麼清楚的論證緬甸、安南銀礦到了乾隆B期而告停產。而且就乾隆A期有文人推估的安南、緬甸銀礦年產量可多達百萬兩，而與拉丁美洲進口到中國的年輸入量或晚明某個時段日本白銀輸入中國的的年進口量相當。

1 魏源，《聖武記》，卷14，頁33。

2 《社會經濟史學》，卷6期2，頁134。

3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London: Brewester and West, preface 1847), vol. I, p.176.

但和田博德也指出安南、緬甸即使在乾隆 A 期的產銀時間是短暫的。安南主要產銀的送〔宋〕星廠雖然 1740 年即有可能開始生產（頁 134），但 1767 年才有具體的安南方面資料指出：「近來場廠盛開」（頁 122），1767 年並有礦夫萬人，至 1769 年且多達數萬，由於其「得銀即帶回本國」，引起安南政府採取抵制政策，至 1775 年而完全停產（頁 122-123）。送星廠臨界廣西，緬甸主要產銀的大山、茂隆二廠則臨界雲南。茂隆廠產銀時間具體為：1747-1752 年（頁 129）。1747 年時有礦工不下二、三萬人（頁 128）。大山廠又名波龍廠。因離雲南較茂隆廠為遠，開礦時間應較茂隆廠為晚（頁 135），1758 年為盜寇劫掠，1759 年礦工盡回中國（頁 133）。其產銀期間，「採銀者歲常有四萬人，人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有歲一百餘萬，齎回內地」（頁 133）。以四萬人歲產一百餘萬兩計，配合以上安南、緬甸產銀年數及礦工數估算其總產銀數為：100x8(1750-1758)（大山）+75x5(1747-1752)（茂隆）+20x35(1740-1775)（送星）=1,875 萬兩。以 1:1.45 折合成 27.2 百萬墨西哥銀元。與表一中持續較久的其他銀供比較起來，安南、緬甸產銀相對極小。

而由和田博德文也可看出茂隆廠主要供應雲南銀需。其文頁 129 指出茂隆廠關閉，致使雲南銀供嚴重不足，銀錢比價漲至 2,500-2,600，甚而 3,000-4,000 文，而與中國其他各地銀價之約為 700-800 文有別（頁 129）。既有資料未明言大山、送星兩礦主要供應中國何處，但以就近之雲南、廣西最為可能。拙作：〈銀與鴉片的流通及銀貴錢賤現象的區域分佈(1808-1854)——世界經濟對近代中國空間方面之一影響〉曾經指出在清中葉中國的貨幣體系中，雲南、廣西，尤其是雲南，儼然自成一個貨幣區。

1847 年雲貴總督李星沅指出：「查滇省哇步皆山，罕通舟楫，商賈交易，用銀而不用錢。自乾隆年間酌定錢價，數十年來，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數十文，不致大有長落。」李星沅所述雲南在商業和軍餉支付方面，長久依賴銀兩的傳統，前任總督也有所指陳。1846 年、1848 年廣西巡撫也提到，由於境內多山，廣西也大量用銀，廣西的銀錢比價也與他省不同。[4]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2（民國 82 年 6 月），頁 100-101。

根據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等資料重建乾隆朝各省之銀錢比價，雲南顯著與他省有別，且爲他省的 1.5 倍左右。廣西則僅略高於他省。[5]以雲南是中國最大產銀省份而銀價相對錢價長期偏高，廣西亦有送星銀產銀供，而其銀價相對錢價仍略高於他省，可見安南、緬甸、雲南合計之所謂國內銀產主要供應雲南、廣西兩省。尤其，乾隆 A 期不比道光年間對安南礦採課有商稅可能透過商稅流通他省，乾隆 A 期政府對到安南、緬甸礦採係採取壓制政策。（和田博德，頁 125 、 130 ）

也因此，雲南、廣西兩省以外中國內地各省（新疆、西藏亦自成貨幣體系）的銀供主要仰賴海上來銀。[6]海上來銀之中，根據 Richard Von Glahn 推估，十六世紀末日本銀佔外銀之 60%。[7]日本白銀輸入中國的數量，從 1560 年到 1647 年間約有一億一千萬圓。[8]入清以後， 1648 至 1697 年間，仍約有二千五百萬銀元。 1709 至 1764 年間則只進口九萬五千元， 1765 至 1840 年間反而由中國出口九十五萬元的白銀到日本（見「汪文」頁 303 表四）。反之， 1721 至 1740 年間中國由拉丁美洲直、間接進口的銀元約六千八百萬元， 1752 至 1800 年間則約進口了一億元（見「汪文」頁 316 表七）。魏源所說鴉片戰爭前後佔中國所使用白銀 60 至 70 %的番銀，主要是來自拉丁美洲。這與明亡以前日本銀與美洲銀在中國銀供中的相對比例，有著很大的轉變。由「岸著」頁 191 之附圖亦可看出此一轉折。尤其如「汪文」頁 307 、 308 所強調， 1775 年之後所進口的拉丁美洲銀幣信較明末清初者爲佳，有助增加貨幣流通速度，且開始被用來作爲銀票的準備（「汪文」，頁 300-301 ），更增加貨幣總量。「汪文」重點在指出乾隆 A 期適值中國重要幣材之日本銀進口大減而美洲銀增加緩慢。

---

5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5（民國 86 年 6 月），頁 22 。

6 福建、廣東兩省在「汪文」頁 306 原已指出其即使在乾隆 A 朝，亦有較多銀供，而與他省不同。

7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s—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3.

8 1601-1644 部份得自「汪文」頁 303 表四； 1560-1600 爲 42,446,992 墨西哥銀元，係根據全漢昇〈明中葉後中日間的貿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卷 55 ，期 4 ， 1984 年，頁 644 當中 1560-1660 年間出現之日本銀出口至中國之數字，取其平均數，再乘以年數得之。

表一 1850 年之前中國各種銀供估計（鴉片戰爭前後之白銀外流量不計）

（單位：百萬墨西哥銀元）

地　區		供給量
緬甸和安南(1740-1775)		27.2
中國境內	明亡以前的銀產量	52.31
	1662-1795	912
	1811-1845	8.13
	合　計	151.4
日　本（1560-1764）		1474
拉丁美洲 (包括經歐洲國家和美國者)	美國(1787-1833)	905
	拉丁美洲(1571-1821)	1506
	以英國爲首的其它歐洲國家	1587
	合　計	398
總　計		723.6

1.生員蔣臣在1643年時估計中國約有二億五千萬兩白銀（葉世昌，《鴉片戰爭前後的貨幣學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71）。梁方仲估計超過一億圓的美洲白銀於1573年到1644年間輸入中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二冊，頁498。）以1兩＝1.45圓將蔣臣的250百萬兩，折算爲362.5百萬圓，扣除自美洲輸入的100百萬圓，和扣除自日本輸入的110百萬圓（參考本文註7），得52.3百萬圓，此約爲明亡以前中國國內產銀量。

2.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冊，頁242，根據《大清會典事例》，1662到1795年每年額課銀爲70,311兩。稅率爲15%，此一時期每年中國國內銀產量爲70,311 ÷ 0.15即468 ,740兩。1662到1795年白銀總產量爲468,740 × 134 × 1.45即94百萬圓。

3.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冊，頁243，根據雲南官員的觀察，1811到1845年每年額課銀爲241,14兩，稅率爲15%。本期總產量爲241,44 ÷ 0.15 × (1845-1811+1)即5.62百萬兩，或5.62 × 1.45=8.1百萬圓。

4. 1560至1600年部份同本文之註7。1601-1764部份得自「汪文」頁303表四。

5.小竹文夫，〈明清時代に於ける銀錢比價の變動について〉，《支那研究》，東亞同文書院三十週年紀念號，1930,頁70根據美國的統計記錄和H .B .Morse與 S. Latourette的研究而得的估算。R. N. Martin,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I, p. 176.有與小竹文夫近似的數字100百萬圓。

6.小竹文夫，〈明清時代に於ける銀錢比價の變動について〉，頁55，引述一位西班牙人的觀察指出1571至1821年間，西班牙將至少100百萬西班牙銀元，自美洲經由菲律賓運

送到中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冊1，頁446，認爲100百萬圓太低，200百萬圓太高，此處將採用平均數150百萬圓，其中也包括了全漢昇，〈論明淸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頁167-171提到，但沒有數量記錄的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得自西班牙，而後轉出口到中國的白銀。

余捷瓊，《中國銀貨輸出入的一個估計》（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頁36，記載1700到1800年有173百萬圓，同上書，頁27，1800到1836年有75百萬圓，兩個數字合計爲248百萬圓。余捷瓊的估計包括了以英國爲首的歐洲國家和美國進口白銀的數量。從248百萬圓中扣除美國進口的90百萬圓，得158百萬圓。這個數字與小竹文夫，〈明淸時代に於ける銀錢比價の變動について〉的估計不同。小竹文夫根據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ing to China*中的資料加以計算。結果是1637-1804年自英國進口35百萬圓（頁63），1776-1817年自法國、荷蘭、丹麥和西班牙（除了馬尼拉）進口21百萬圓（頁66），1807到1820年自英國進口10百萬圓的白銀到中國（頁66）。總共只有66百萬圓，小竹文夫自己都認爲這個數字太低。

「岸著」（岸本教授《淸代中國の物價と經濟變動》簡稱）第五章頁 187 認爲「汪文」依賴 H. B. Morse 所記東印度公司 A 期美洲白銀進口減少數據，論證此時貨幣成長緩慢實應質疑，因該公司所記白銀相較實際進口額爲低。「岸補」再度指出，東印度公司以外，英國民間商人的交易值得注意。岸本教授此項補充是有意義的，只是英國私商所運銀數仍無數據。

而「汪文」頁 304 註 39 原已指出，A 期貨幣成長緩慢，尙非完全依據東印度公司數據資料，而是以日本銀供給減少的數據資料尤爲關鍵。「汪文」頁 303 表四指出：當時流入中國的日本銀額，從十七世紀上半葉年平均約 140 萬元，減至十七世紀下半葉約 86 萬元，而從十八世紀初期至中葉，輸入總額且不及 10 萬元。十七世紀後期，日本銀固然如「岸補」所說，已因 1668 年日本幕府禁止而減少輸入中國，但當時人口曾因明淸之際的戰亂而大爲耗減，[9]「汪文」頁 299 表二之人口成長率只是供參考的推估數字，就岸本教授所說的人口調查因素而言，「汪文」註 26 已提及此時之人口調查亦爲人口快速增加之結果。「岸著」頁 293 也指出 1741 至 1755 年糧食暴動的頻繁。「岸著」頁 296 認爲反對富民將米糧運銷遠方的因素是暴動主因，但「汪文」頁

9 D.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9), pp. 184-185.

296 認爲在此因素之外，當時官吏都感到是人口繁滋所致，更是值得注意。由上可知，「汪文」A 期要分用白銀的人口較十七世紀後期爲多，而「汪文」A 期中日本銀之年輸入量之不及十萬，與十七世紀下半葉之仍約有 86 萬元，不可同日而語。

2.有關乾隆 A 期貨幣不足的文字證據

有關乾隆 A 期之貨幣不足，文字資料更可佐證。黃卬（經岸本教授指點，由卯改正）《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上〉，頁 9b，「交易銀錢」指出：「觀於市，若昔錢少今錢多，然昔少而價平，今多而價貴，則知昔之多用銀者，由銀之留於下者多，而非由錢乏；今之專用錢者，由銀之留於下者少，而非以錢足也。民生窮困之由，觀此亦可悟矣。」銀幣大量減少，銅幣雖用以補充，民生仍因貨幣不足而感困乏。

雖然，在 A 期中，不若「岸補」所說之有十七世紀後期「銀荒」一個描述語，但除黃卬 A 期銀少的觀察之外，「汪文」頁 306-307 所列朱叔權（在註 44 之內）、汪輝祖、鄭光祖等都指出與黃卬相近的觀察。「汪文」頁 306 提到慕天顏曾指出 1649-1650 之順治年間白銀「各省流行，所在皆有」，頁 308 註 55 以及頁 309 則提到雍正後期漸因銀少而有以銅錢代銀的趨勢。十七世紀後期相對前期的銀供落差遠比雍乾之間爲大，可能說明十七世紀後期有「銀荒」一語，而雍乾之間只指出以錢代銀的趨勢。鄭永昌的研究也指出乾隆前期因白銀供應不足，民間對銅錢需求增加，導致政府採取容忍私鑄的政策。[10]而「汪文」頁 301 戶部、工部於乾隆前期大量鑄錢，亦白銀供應不足，民間對銅錢需求增加所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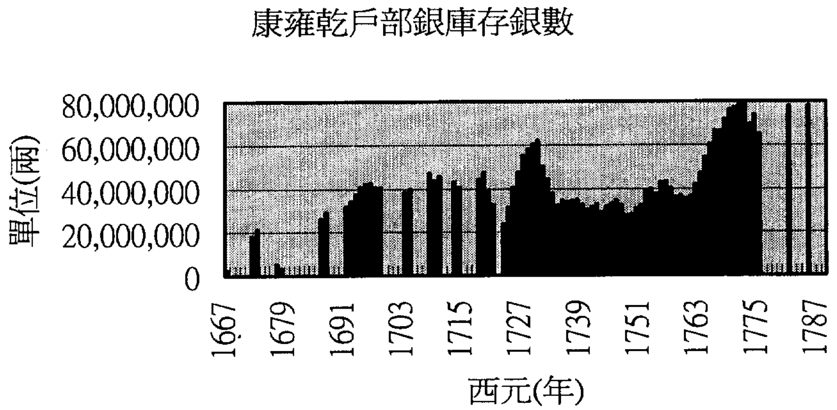
3.A 期有過一段戶部盈餘相對之前之後減少的時期

圖一是根據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上諭檔所做康雍乾戶部銀庫存銀數的長期性統計。除康熙朝、乾隆朝部分年份霉爛之外，原檔存有康雍乾三朝幾乎每年的數字。由這份資料可知戶部銀庫積存銀數 1730 年（雍正八年）時曾相對康熙朝者達到高峰，之後有三十二年的時間，均低於此數， 1748 、1749 年（乾隆十三、十四年）且達到最低谷，之後上揚，至 1765 年（乾隆三

10 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頁 18-28 ； 33 。

十年），超過1730年（雍正八年）之最高峰，之後長期為1748、1749年最低谷之兩、三倍，至1775年（乾隆四十年）、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及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圖一）。

圖一　康雍乾戶部銀庫存銀數



資料來源：根據鄭永昌先生提供〈康雍乾戶部銀庫歷年存銀數〉，《歷史檔案》，1984年4月及《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七冊，頁97-101，頁791; 第十八冊，頁222之資料製圖。

「岸著」頁491有一張與圖一根據相近資料所繪的圖，但由圖一較能看出「汪文」所論A期有過一段戶部銀庫積存銀相對之前之後減少的時期。「岸補」引黃印的觀察指出：雍正朝田賦催科較急，乾隆年間多有蠲免（原文見於《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上）是值得注意。但就朱叔權、汪輝祖、鄭光祖、黃印等人的觀察而言，乾隆初年的白銀明顯並不夠用。

稅收的多寡可以受財政政策稅課的影響，也可以受整體經濟的影響，就雍、乾之際戶部存銀之由多轉少而言，這兩方面都可用來說明。「岸補」另外指出：「民間的白銀被戶部銀庫吸入累積的結果，使得民間銀的流通量減少，這樣關係的假定也有可能。」就黃印乾隆年間多有蠲免的證據看來，[11]

[11] 百瀨弘，〈清朝異民族統治に於ける財政經濟政策〉，《東亞研究所報》，號20（1943

則無法由財政收入的角度詮釋何以乾隆初期戶部存銀少而乾隆晚期戶部存銀多。更何況乾隆朝所支出的 15,052 萬兩軍費之中，有 9,753 萬兩是在 1767-1794 年間花用，[12]B 期的財政支出並不少於 A 期。乾隆初期戶部存銀少而乾隆晚期戶部存銀多的轉折仍需由整體經濟的變化來加以瞭解。

（二）關於諸物價俱貴及奢侈風氣拓展的問題

「岸著」第五章引 1752 年廣東巡撫蘇昌一道奏摺：「至近日，米薪布帛諸食用物價，三倍於前」，又引 1755-1761 年間蔡顯提到：「物競貴而米亦昂」，指出 1750 年代諸物價俱貴，而非如「汪文」所說之「米價獨貴」或維生物資昂貴。「岸補」又提出「汪文」A 期有趨於奢侈的習慣。岸本教授這些觀察使「汪文」所說米價或維生物資獨貴的說法須加修正。但因為以下理由不能否定「汪文」A 期人口(P)↑＞貨幣(M)↑＞農產(Ag)↑的基本立論：

「汪文」頁 311 曾引述乾隆皇帝認為「生齒日繁」是絲價乃至一般物價上漲的主因。這會導致：即使每人使用的絲未增加，因總人口增加了，絲的總體需求增加，也會導致絲價上漲。當然，「岸補」所說的奢侈風氣拓展也會導致絲價上漲。

岸本教授所引奢侈風氣拓展的觀察亦出於黃卬《錫金識小錄》，會讓讀者感到何以該書既指出每人所持有的貨幣不足卻擴大奢侈之風的困惑，但如再細讀黃卬此書，卷一〈備參上〉，頁 18b 可知奢侈風氣主要在城市拓展：「城居者多貧，……近日米薪布帛諸實用物價三倍於前，而鮮衣美食之風，日甚一日，又罕習恆業，多博飲游俠，夫安得不貧，至鄉民淳愿，雖不如前，而力田之勤，則前所未逮。」「岸補」所引則松文（頁 551-553 ）也指出 A 期中浙江蕭山及江蘇金匱等地的鄉村依然純樸。更重要者，「力田之勤，前所未逮」導致黃卬所說的：「田值之昂，較雍正間不啻倍蓰」(同上，頁 19a)，並未為農村帶來全面性的生活改善。《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上〉，頁 8a 在米價漲為三倍之後指出：「富民一歲之收，比昔三歲之入，貧民一日之食比三日之餐，富益富，貧益貧，貧百而富一，已伏不靖之機。」在少數人轉

年 2 月），頁 51-58 有列有雍正、乾隆朝之蠲免事例。

12 松井義夫，《清朝經費の研究》（滿鐵經濟調查會， 1935 ），頁 104 。

趨富裕，大多數人轉趨貧窮的情況下，平均每人所得仍是減少的。

至於城市經濟的成長不如地方經濟，何以城市相對鄉村奢侈？黃卬與「岸補」都由奢侈導致貧窮的角度立論，從《管子》以來論侈靡可以創造就業的解釋邏輯也值得重視。[13]

（三）關於城鄉發展及銀、銅兩幣關係問題

岸本教授提及農業成長與土地價格問題。「汪文」頁 300 指出 A 期亦為農業成長期，即 Ag ↑，但農業成長趕不上人口成長，故頁 325 所說 A 期的農業危機是就不夠扶養人口而說得。「岸著」頁 158 所說田土價格上漲一事，基本上與「汪文」的論點並不相違。「岸著」中引嘉慶年間周天爵言「饑年田土必賤」，一則此乃嘉慶年間事，二則文中的「饑饉」，可能是 P ↑ > Ag ↑ > M ↑，即貨幣成長率小於人口成長率也小於農業成長率。如此的關聯則田價將會下跌，主要因為沒有足夠的貨幣購置田地。但「汪文」所說 A 期，是屬於 P ↑ > M ↑ > Ag ↑，農產、貨幣不敷人口成長的需要，但在貨幣成長率仍大於農業成長率（M ↑ > Ag ↑）的情況下，田價仍將上漲。

岸著中頁 203 引黑田明伸認為地方經濟更加成長，與「汪文」亦不衝突。由於銅錢適用於短距離及小額交易的地方經濟，在「汪文」A 期之中，人口和銅錢均顯著增長，雖白銀成長較慢，地方經濟仍將更為成長。

「岸著」第十章頁 401-402 及「岸補」引黃卬《錫金識小錄》描述乾隆初年江蘇地區鄉村人民購田之盛，城市生活則相對貧困，使「汪文」A 期的城鄉關係更為清楚。龔煒(1704-1769)所著《巢林筆談續編》，卷上，頁 196 指出：「我邑〔江蘇崑山〕東西兩塘，甲族萃處，往時棟宇凌雲，軒車盈道，一交冬月，米船擁塞。比年各宦所業田，盡歸於鄉，瓦冷煙寒，斷楹不續，人蹤稀少，草蔓當街，奇荒之後，益復拆毀，曲巷小衖，白地居多。偶一入城，不勝泫然。」再度指出「汪文」A 期城市經濟的蕭條。

由於銀幣主要用以支撐長程貿易與城市經濟，「汪文」A 期城鄉的以上發展也可用來了解何以「汪文」A 期在銀幣需求(DS)↑ < 銀幣供給(SS)↑ <

13 參見 Yang Lien-sheng, "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 An Uncommon Idea in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1/2 (June, 1957), pp. 36-52.

銅幣供給(SC)↑＜銅幣需求(DC)↑的邏輯關係下導致銀賤錢貴。也因長程貿易成長緩慢，造成地方經濟的市場及因之而來的資金較爲不足，故有地方經濟即使成長仍不夠扶養人口的現象。到了「汪文」B期則在長程貿易拓展的刺激下，循著：銀幣需求(DS)↑＞銀幣供給(SS)↑＞銅幣供給(SC)↑＞銅幣需求↑(DC)的邏輯關係導致銀貴錢賤。

「汪文」頁292曾提出：「乾隆初、中期的貨幣短缺抑減商業化幅度，強化低價貨幣的需要，而乾隆晚期的貨幣增加擴大商業化幅度並強化高價貨幣的需要」的推論。王宏斌著《晚清貨幣比價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也提及馬克斯受 Jacob 影響而指出：在整個商業規模變小的情況下，供零售交易用的賤金屬需求反而增加，貴金屬價格會相對下跌，賤金屬價格則相對上揚。而在社會經濟較爲發展時期，貴金屬貨幣需求相對賤金屬增加的快。[14]「岸補」對「汪文」提出這樣的質問：「如果黃印認爲錢↓＜銀↓的話，那沒有辦法說明錢價的昂貴。相反的，錢↓＞銀↓的話，不是和「汪文」的主張恰好相反嗎？」事實上「汪文」說的不是：錢↓＞銀↓，而是銀幣供給(SS)↑＜銅幣供給(SC)↑，更重要的是「汪文」還加入「經濟景氣會影響貴賤金屬的不同需求」的概念而得：銀幣需求(DS)↑＜銀幣供給(SS)↑＜銅幣供給(SC)↑＜銅幣需求(DC)↑→錢貴（長程貿易、城市經濟的成長不如地方經濟）的全盤關係，而與「岸補」單純由銀銅兩幣的供給來加以論述有別。也就在景氣較差時，對貴重金屬的需求會有所低減，「岸補」所說A期銀息甚微的現象也因此可以瞭解。「經濟景氣差時會影響賤金屬需求增加」的概念也可使「岸補」所說「錢被多用而且錢價高這不可思議的現象」變得可以思議。和田博德提到在A期的雲南對開採銅礦比開採銀礦積極：「大吏不達時政，禁銀廠以事銅廠，自是銀耗銅充」（頁129），由「經濟景氣差時會影響賤金屬需求增加」的概念也可明白大吏並非不達時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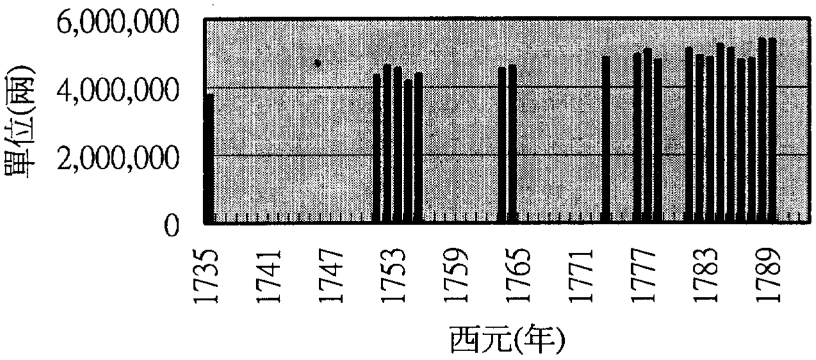
（四）關於A、B期的分期點問題

「岸補」強調A期現象爲1748年之特殊現象，就生於1730年的汪輝祖

14〈戰爭與和平：王宏斌著「晚清貨幣比價研究」之評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11（1991年3月）。

所說：「憶十餘歲時，米價斗九十，或一百文。間至一百二十文，即訝其貴。」人們沒有太多貨幣支應略微上漲的糧價的情況可以是 1740-1749 年間之事。又就黃卬所說：「自乾隆五、六年後，銀漸少錢漸多，至今日率皆用錢。」朱叔權、鄒一桂所說以錢代銀的現象分別是 1742 、 1746 年事。銀缺的情況，1741 年至 1752 年間明顯存在。雖然英美貿易或輸入白銀乃至關稅、戶部存銀，1750 年代已見增加（依「岸著」及「岸補」英美貿易方面論述及圖一、圖二），但此另需與人口成長並觀其對每人所得的影響。如汪文頁 306 引諸聯所說：「聞古老云：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銀；二十年(1756)後，銀少而錢多，偶有洋錢，不爲交易用也。」則銀少的情形還延續到 1756 年以後一段時間。

圖二　乾隆年間榷關稅收總額



資料來源：根據鄭永昌先生提供〈清初榷關制度之探討與乾隆年間關稅資料的初步整理〉由各年《明清檔案》整理之表格製圖。

民生貧富情況的轉折點無法像 1911 辛亥革命那樣的人爲事件那麼明確，「汪文」以 1775 年爲粗略分期點的根據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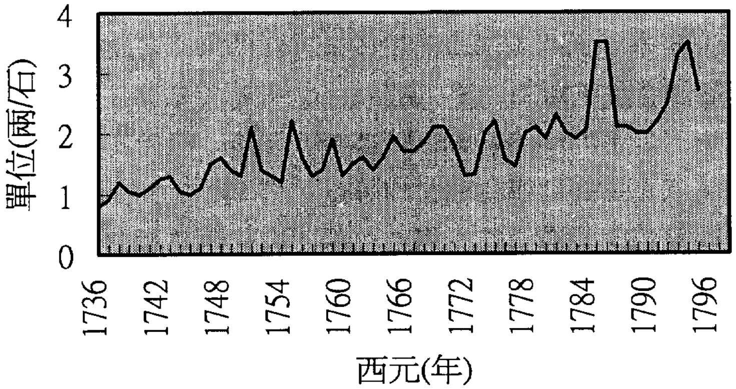
(1)「汪文」頁 307 引鄭光祖等文人的觀察指出：1775 年左右較方便使用的美洲白銀才流到江浙，之後二十年間，「番銀之用廣於紋銀」。而關稅在 B 期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圖二）。

(2)頁 308 註 55 提及 1775 年爲陳昭南教授所研究之「錢貴」轉爲「銀貴」的轉捩點。雖然「汪文」所引文人觀察，以江浙地區爲主，因 1775 年「錢貴」轉爲「銀貴」現象頗具全國性，故本文之討論仍以中國內地福建、廣東、雲南、廣西以外的各省爲範圍。但日本來銀減少是否會使與日本經貿關係的江浙地區首當其衝也值得注意。

(3)「汪文」頁 295 引生於清雍正八年(1730)的清代幕友汪輝祖《病榻夢痕錄》 1792 年所說：「憶十餘歲時，米價斗九十，或一百文。間至一百二十文，即訝其貴。乾隆十三年(1748)，價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樹皮俱盡。地中產土如粉，人掘以資生，名曰觀音粉，有食之死者。十餘年來，此（米價斗一百六十文）爲常，或斗二百錢，則以爲賤矣。」 1794 年又說：「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尙樂生。」就 1794 年往前推算十餘年， 1775 年爲最早的一年。

(4)浙江蕭山米價在 1775 年之後明顯地長期上漲。「岸補」就圖三所根據的資料（見於「汪文」頁 298 ）指出乾隆 A 期糧價沒有明顯上漲，而提出糧食不可能長期趕不上人口的立論，值得重視。此點由汪輝祖有關 A 期糧價的描述語亦可印證。所以 A 期的 P ＞ Ag 的差距應該不大，但因 A 期有貨幣不足的現象，此時之糧價上漲仍然較爲可能是人口驟增的影響，故仍有若干 P ＞ Ag 的現象。而由圖三可見 1775 年左右之後，米價顯著有由一石一、二兩之間轉爲一石兩、三兩之間的結構性上漲。此一現象與圖一及圖二戶部存銀、關稅依然增加的情況並存，在此同時鄭光祖等文人觀察到： 1775 年左右較方便使用的美洲白銀才流到江浙，之後二十年間，「番銀之用廣於紋銀」、汪輝祖提到雖百物騰貴，人尙樂生，貨幣於 1775 年之後對物價、民生的影響實爲清晰可見。

圖三 乾隆年間的米價



資料來源：田仲一成，〈清代浙東宗族の組織形成における宗祠演劇の機能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卷44，號4，頁48-50。

「岸補」提及乾隆文人洪亮吉 B 期人口壓力擴大的指陳。細讀洪亮吉原文，深感其論述邏輯值得質疑，其謂「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 而貨不加增……于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卷施閣文甲集》，第一，頁 10 ）。何以「商賈者，十倍于前， 而貨不加增」？在現代經濟之中，將農業、製造業、服務業均視爲財富構成的因素，就洪亮吉看來，似乎只有農業與製造業才會構成財富，服務業則不能算數。而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的概念也是「汪文」所明顯批評的：以土地爲農業生產的唯一根據，而忽略了透過市場經濟所獲得的貨幣，也是農業生產的重要憑藉。既然「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何以「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各昂其價的布帛粟米難道不來自農工賈嗎？

「岸補」也提及乾隆末期貿易順差縮小，可能增加的貨幣也會減少，岸

本教授在這裡忽略了「岸著」本身也提過的：貨幣總供給量來自貨幣實際供應量與貨幣流通速度之乘積的觀念。「汪文」引鄭光主祖等人的觀察指出有花邊(fringe)而較可靠的番銀流通的擴大，以及以銀爲準備但發行額會略超過準備金的銀票都在乾隆 B 期進展，貨幣流通速度及貨幣實際供應量都會有所增加。

當然，洪亮吉所說的人口增加現象是存在的，「汪文」也指出這一點，「汪文」也並無意說乾隆 B 期的每個(every)人都更富裕了，「汪文」所說的每人所得增加，是平均(average)的概念。「岸補」引用的則松文也提供了乾隆 B 期奢侈風氣更拓展到鄉村地區的證據（頁 551 ）。

由鴉片戰爭前夕黃爵滋的奏摺也可看出乾隆朝的相對富裕與銀的流入有關：「臣維皇上宵衣旰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至勤至切；而國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勢漸積，一歲非一歲之比，其故何哉？考諸純廟之世（乾隆朝），籌邊之需幾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又幾何？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至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宵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嗇耶？臣竊見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洋。」[15] 1808 年以前的嘉慶朝(1796-1808)共花用 3,390 萬兩軍費， 1825 至 1848 年的道光朝共花用 2,830 萬兩軍費，乾隆朝則花費 15,052 萬兩軍費，其中有 9,753 萬兩是在 1767-1794 年間花用的。[16]百瀨弘〈清朝異民族統治に於ける財政經濟政策〉頁 50 曾指出康熙戶部盈餘 800 萬兩、雍正盈餘 2,400 萬兩、乾隆盈餘 7,800 萬兩。「岸補」認爲這個乾隆盈餘是乾隆四十六年的資料，圖一之乾隆五十二年資料亦有七千多萬兩。「純廟之世」即使花費甚多，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黃爵滋以乾隆以後朝代的人提出這樣的陳述，必然是乾隆後期留給嘉道人士的記憶。

一反以往有關清乾隆朝由盛而衰的一般看法，就經濟面而言，清乾隆朝實爲由衰轉盛。

---

[15] 齊思和整理，《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北京：中華書局， 1959 ），頁 69 ，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十日，〈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

[16] 松井義夫，《清朝經費の研究》，頁 104 。

三、總　結

(1)岸本教授之認真論學，使筆者獲益良多。有關乾隆 A 期之內安南、緬甸銀產仍不敷雲南、廣西所需，以及該期之內城鄉差異發展，鄉村雖有新富，但大多數農民愈趨貧窮的瞭解，均經此討論始有所領悟。有關「汪文」論旨，於此亦可更清楚說明。[17]

(2)「岸著」頁 3 的序言自述其畏友山本進教授謂其書各文之間的關連性並不明顯。拙文〈當代台灣的史學與社會〉曾論及台灣史學乃至晚近世界各學門知識都傾向以為「整體」是「部份」的結合。事實上「結構」(「部份」與「部份」間的關係)比「部份」更決定整體特質。但「部份」是具體的，「結構」是抽象的，在實證主義的理念下，知識人或史學家常以極大的學術熱忱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積沙成塔，而忽略了除非有鋼筋水泥黏固間架，積沙實難以成塔。[18]「汪文」的學術興趣在於根據可能掌握的信息指出清乾隆朝由約 1775 之前的民生較為緊縮轉為之後較為寬裕背後貿易、貨幣、人口、貴賤金屬貨幣等經濟變數環環相扣關係的階段性變化。著重「結構」的研究途徑係歸納與演繹並採，不若著重「部份」研究者採用歸納的成分居多。著重「結構」的研究，除了與著重「部份」者同樣要面臨新的證據將影響歸納的檢驗之外，比著重「部份」者更要面臨演繹推理是否嚴謹的檢驗，但又比著重「部份」者更能指出瞭解一個整體的根本問題。利弊得失之間，學者常有不同抉擇，但不同抉擇的學者之間可有許多交流的空間，岸本教授與筆者放下目前的研究課題，就兩人之早期研究

---

17 「汪文」有關十七世紀危機的討論，岸本教授並未加以評論，但因「汪文」此點，筆者過後已有所修正，在這討論「汪文」的文章裏，筆者想順便指出：1989 年寫「汪文」時，筆者是接受 Wakeman 與 Atwell 等的觀點，但這個觀點到了 1990 年 12 月，筆者在《新史學》發表的〈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一文中已有過修正，其後更透過學生鄭永昌的〈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全面修正。基本上除反駁明亡與世界經濟的關聯之外，也把明末清初銀荒的原因由外源論轉為內因論，即強調海禁的因素，而最近由 Von Glahn 在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討論十七世紀危機的文章，筆者又把此次中國的銀荒更加歸因於日本的銀荒。

18 林滿紅，〈當代台灣的史學與社會〉，《教學與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期 18 (1996 年 6 月)。

展開對話，也可見此種交流極具學術意義。非常感謝岸本教授，也感謝讀者。